

哥大人與臺灣高等教育 ——三位大學校長辦學理念初探

張 力*



《摘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近代中國的淵源甚深，二十世紀之中，留學哥大並返國服務卓有成就者，不計其數。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雖有近三十年的時間，未准許留學生赴美進修，但在臺灣，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及副所長，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留學政策持續推動，且由於臺美關係密切，留學美國人數最多。本文選擇學成之後回到臺灣，在其日後生涯中均曾擔任過大學校長的三位哥大校友：李煥、張京育、劉源俊，對其留學經驗與在臺主持大學教育行政的關係，進行討論。

關鍵詞：哥倫比亞大學、李煥、張京育、劉源俊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哥大）與近代中國的淵源極深。雖然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並非從哥大取得學位，但在 1880 年代清朝首次派遣的留美幼童之中，就有唐紹儀（1860-1938）、周壽臣、吳仰雷等三人就讀哥大。¹二十世紀初，出國留學的風氣大開，不僅有官費生和自費生出洋留學，更有利用美國退還的庚款而負笈美國者。這一時期許多優秀的年輕學子選擇哥大就讀，而他們學成之後返回中國，在各行各業有著傑出表現，又使哥大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學子的最愛。

中國學生為何會嚮往哥大？1919 年至 1923 年在哥大攻讀歷史的蔣廷黻（1895-1965）道出了主要原因：

¹ 錢鋼、胡勁軍，《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頁 116。這批留美幼童中，原就讀耶魯大學的張康仁，在奉召返回中國之後，又再度來美，並在哥大法學院畢業。

留學生往往是羨慕有關大學中著名學者的名氣才進那所大學的。中國學生進哥大更是如此。我們未入哥大之前，就聽到許多哥大教授的大名。如果不是為了上這些被認為有名、傑出的老師的課，我們就不會進哥大。²

1915 年 9 月來到哥大哲學系就讀的胡適（1891-1962），也從當時哥大一些著名的教授中體認到，哥大不僅歷史、哲學、社會、教育等人文學科享有盛名，其實在科技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³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失敗，而將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北。當時維護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最重要的人物，可說是擔任駐美大使的顧維鈞（1888-1985）和擔任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蔣廷黻，他們兩位哥大校友在外交戰場上折衝尊俎，爭取與國，使臺灣得以在最困難的環境中逐漸穩定下來。而在國內外早已聲譽卓著的胡適，則於 1957 年出任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領導人。哥大校友對臺灣有重要貢獻者，當然不只這三人。看到哥大校友的表現，臺灣民眾耳濡目染，對哥大倍感親切。更由於臺北政府一向與美國維持著密切的關係，每年出國的留學生也以到美國為最多，因此哥大仍有著一批又一批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和進行訪問研究的學人。1979 年 6 月 16 日哥倫比亞大學同學會在臺北市成立，此後每年年底舉行的會員大會，都是

² 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再版），頁 74。

³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年再版），頁 85-86。

熱鬧非常。⁴

雖然臺灣在 1980 年以前的留學美國熱潮之中，許多留學生學成之後選擇留在國外，此一現象不時引起社會各界的批判，不過返國貢獻所學的也大有人在。從 1950 年代起，哥大校友在臺灣各個領域中表現傑出者，頗不乏人。而踏入教育界，且有機會主持大學者，更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因為大學校長在臺灣社會中享有最高聲望，同時教育行政工作本身可以讓曾經負笈哥大的校友，有機會將其在美所學，直接傳承給下一代。1949 年以前的哥大早期校友蔣夢麟（1886-1964）、胡適，先後主持過北京大學，本文則以在臺灣擔任過大學校長的李煥（1917-）、張京育（1937-）、劉源俊（1945-）等三位校友為例，針對其教育理念和實際作為作一介紹。

一、李煥與中山大學

李煥生於湖北省漢口市，初中就讀武昌的湖北省立二中，畢業後在漢口江漢中學完成高中教育。1937 年考入中央警官學校第四期，服務數年後於 1941 年考入復旦大學法律系，再於 1944 年 3 月考入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自此和當時擔任教育長的蔣經國（1910-1988）結下長達 44 年的師生緣。自 1944 至 1954 的十年間，李煥先後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秘書、瀋陽市政府宣傳處副處長兼《瀋

⁴ 哥倫比亞大學同學會是由沙允仁、王紀五、李煥、余夢燕、劉源俊等校友發起籌組，見《聯合報》，1979 年 6 月 16 日，頁 6。

陽日報》社社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大連支團書記，以及中國國民黨青年部第二處副處長、處長、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總幹事，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秘書。⁵

1954 年美國紐奧爾良市召開一項國際性的警察首長會議，內政部因無適當人選，遂找救國團主任秘書李煥代表參加。李煥希望趁會議結束後，直接留在美國進修。蔣經國初時並未同意，但經過一夜長考之後，反而發給 3,700 美元，鼓勵他趁年輕時多讀些書。臨行之前，李煥已打算學習教育，遂向多人請教申請何校為佳？眾人異口同聲建議他申請哥大，這是因為民國初年哥大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教授訪華頗受各界崇敬。此後受其影響而申請哥大攻讀教育的中國人，所在多有，因此李煥就以進入哥大研習教育為首要目標。⁶

到了紐約後，李煥初時為是否改申請紐約大學而有些猶豫，因為對他而言，紐約大學補修學分較少，且學分費略便宜。後在友人力勸之下，仍然選擇了哥大。37 歲才開始的留學日子，李煥首先遭遇遇到的困難是英語問題。由於就讀復旦大學時學校並不重視英語教育，因此李煥的英語基礎薄弱。進入哥大後雖有六週的英語課程，但仍未能有效提昇聽力，致使李煥萌生回國念頭。此時友人再度鼓勵，指出

⁵ 李煥的早年經歷及其與蔣經國的關係，參見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

⁶ 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 90-91。李煥先生拍攝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以下同），VA782.886/8460.V.1-17。

半年以後即可適應，李煥才決定繼續攻讀，並利用在電影院連續看影片，與到紐約市小公園裡和老年人聊天，來增進自己的英語能力。

李煥就讀哥大教師學院，和其他來自臺灣的學生一樣，得面對每一門課每一週的作業，因此經常通宵達旦打字，以完成報告。哥大留學生活令李煥印象最為深刻者，在兩個方面：首先，當時臺灣對於學校師資的規定是，師範學校畢業者教小學，大學畢業生教中學，獲有研究所的碩博士學位者，則教大學。但他發現，哥大教師學院常有中、小學教師進修，攻讀博士學位，李煥遂向其師請教，其師答曰：「你認為中學教師比小學教師高一等嗎？其實完全一樣，只是教學的對象不同。小學老師教兒童，要研究兒童心理、兒童教學法；中學校師教育青年，就要研究青年心理、青年教學法。他們的責任和工作範圍相同，並沒有高低之分。」此一觀念對李煥日後提昇臺灣師範教育的政策，有很大的啟發。

其次，李煥的指導教授要求他利用週末住在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裡，藉機瞭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從生活細節的觀察，李煥體認到美國家庭教育中如何培養適當的人際關係，進而重視每個人的公德心。這也是他日後接掌教育行政時所特別注意的事。⁷

1956 年李煥獲教育碩士學位後返臺，仍回救國團任主任秘書，1963 年 9 月升副主任。自 1967 年起到 1979 年，除於 1970 年至 1972

⁷ 有關李煥在哥大的求學經驗，尤其是對美國人公德心的觀察，見李煥先生拍攝帶，VA782.886/8460.V.1-17，及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頁 91-97。

年擔任過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餘時間均是擔任中國國民黨的重要職務，包括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組織工作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出任這些職務當然與蔣經國的安排有關。而李煥與教育工作的關係，則是有 16 年的時間，擔任臺灣省立農學院、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蔣經國知道李煥對教育甚有興趣，不僅鼓勵他持續在大學兼任，更於 1979 年中山大學在臺復校時，指派時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的李煥，出任籌備處主任。對於這項任命，李煥先是認為自己尚非德高望重之人，而有所猶豫；此外，中山大學在臺校友會也要求以中山大學校友為籌備處主任，而反對此項任命。蔣經國則嚴厲表示：「校友會不能把持學校。如果每一所學校只用自己校友當校長，即是形成教育割據。國立大學校長的用人權在教育部，有意見可以反應，但是不能嚴厲主張。」蔣經國要李煥不必再與教育部商量。有了蔣經國的強力支持，李煥遂接受任命，展開中山大學籌備復校的任務。

中山大學雖是復校，但因該校原是設在廣州，國共內戰期間，學校資產並未遷來臺灣，因此所謂在臺復校，其實還是從頭做起。教育部規定中山大學的發展，初時暫設文理、工商、海洋三個學院；第二期則將三個學院擴展為文、理、工、管理、海洋五個學院，最後再增設醫學院和藝術學院。中山大學在 1979 年取得高雄市西子灣的校地後，即準備規劃校園、建築校舍。由於中共在 1949 年以後，仍然維持著廣州的中山大學，故而李煥認為，在臺復校的中山大學，「不論為維持國家教育之觀瞻計，為表示對國父之尊崇計，或為求不致與廣

州原有校舍規模相形見绌計，本校校園與校舍之規模決不能因陋就簡。」⁸ 為此，李煥到美、日兩國多所大學考察，對日本筑波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印象最為深刻。前者也是新建不久，學校圖書館藏豐富、管理現代化，且位於學校中心，師生使用方便，以致中山大學也將圖書館規劃在校園中心。後者也是位處海濱，其建築、設備如何抵抗海風侵蝕，可供同樣建於海濱的中山大學參考。李煥極重視建築物的堅固耐用，要有長遠打算，不能因陋就簡。於是首開校舍建築採比圖方式之例，成立建築師委員會和評審委員會，對參與競圖的 16 個規劃案評比。選定之後，再經行政院長孫運璿和總統蔣經國同意，校園建設於焉展開。1980 年 7 月正式設校，並招收第一屆學生。

李煥認為「要辦好一所大學，其條件大致有五：一是健全的師資，二是豐富的圖書期刊，三是新穎的儀器設備，四是實用的資金，五是基礎良好的學生。」⁹ 為了充實圖書資源，中山大學第一年開辦

⁸ 〈本校發展的方向〉，《國立中山大學校刊》，創刊號（1982 年 1 月 1 日），頁 11。

⁹ 李煥，〈做一個中山大學的拓荒者〉，《國立中山大學校刊》，期 2（1982 年 9 月 1 日），頁 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以「校舍的建築必須整體規劃」替代「實用的資金」，而總結這些是「大學的有形基本條件」，而大學還有更重要的無形條件，「就是要培養優良的校風」。在該文中，李煥還指出大學教育發展的取向，要能兼顧世界性和民族性、兼顧人文與科技、兼顧現在與未來；大學教育的任務，則須德育與智育並重、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學與研究並重、學校與社會並重；完整的大學教育，應該包括集體教學、個別指導、學術活動、自我學習、社團活動、體能訓練、自治管理、社會服務等內容。見李煥，〈大

費 6,000 萬元臺幣的一半，用於訂購圖書期刊，以後各年也由學校分配固定經費購書。李煥且不時到立法院交涉，希望多獲得一點經費。為了健全師資，使得優良教師有意願到臺灣南部任教，李煥不僅在高雄市區購買公寓，提供教師良好的住宿環境，也顧慮教師北上參與學術活動，與家人團聚的需求，而安排往返交通車。此外還成立教師托兒所，募集新臺幣 3,000 萬元基金，以每年 150 萬元利息補助教師研究及出國進修，並藉以改善教師待遇。而為了爭取優秀學生前來高雄就讀，和本地高中生留在高雄，李煥在第一年招生時，曾和教師赴全臺 26 所高中，向應屆畢業生說明建校理念，及未來發展，同時對以第一志願考入中山大學的學生，提供優厚的獎學金。¹⁰ 李煥多管齊下的做法，使得中山大學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另外，李煥對大學教育的功能和中山大學的目標，還有如下之說明：

我國大學教育功能是傳承並發揚民族固有的文化，研究和發展現代的科學知識，推動人類社會向前進展、向上提升。中山大學的最終目標，更要重視國父建設一個現代化新中國的理想。所以中山大學不僅以培養人才為已足，更要集中全體師生的智慧，從事高深的學術研究，以學術促

¹⁰ 學教育的境界》，《中華學報》，卷 11 期 1（1984 年 1 月），頁 1-10。

¹⁰ 李煥，〈篤路藍縷、以啓山林〉，《國立中山大學建校十週年特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1990 年 11 月），頁 16。訪問李煥拍攝帶，VA780.886/8460 V.2-6。

進國家社會不斷進步，促進三民主義建設的圓滿完成。¹¹

在此種觀念之下，中山大學第一年招生的六個系所之中，就有中山學術研究所，日後又設立中山學術研究中心。這就中山大學而言，符合其「弘揚中山先生的學說思想，建立青年正確的人生觀」的創校期望。¹² 其實年輕時期的李煥，在感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武漢地區就讀高中，開始閱讀《三民主義》後，感觸甚深。故其主持中山大學，對他有著更特殊的意義。

1984 年 7 月 1 日，李煥調離中山大學，出任教育部長。其在部長任內所推動的計畫，自然包括了各級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李煥強調國立大學應該發展研究所，私立大學發展大學部。由於此時大專學校已較過去為多，高等教育亟待提昇，國立大學不必和私立大學競爭大學部學生。國立大學研究所的師資、設備提昇後，可自各校大學部廣招研究生，施予更進一步的學術和專業訓練，如此國家整體高等教育當能有所進步。此一想法也是李煥在中山大學校長任內所極力強調的。另一積極作為，則為前文提及的在哥大對師範教育的體認。在教育部長任內，李煥完成了師專改制為師範學院的措施，使得日後小學教師能接受師範體系的大學專業訓練。李煥自己

¹¹ 李煥，〈賀中山大學校慶〉，《國立中山大學校刊》，期 19（1988 年 11 月），頁 5。

¹² 李煥，〈談中山大學與青年問題——答耿榮水先生訪問〉，收於《一心為國——李煥先生言論選集》（臺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1990），頁 168。

認為這一新制的實施，是他在教育部長任內最大的貢獻。¹³

二、張京育與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的誕生，可以追溯到 1927 年 5 月在南京創立的中央黨務學校。該校其後於 1929 年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1946 年再度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1954 年政治大學在臺北木柵復校。張京育於 1989 年 8 月 1 日繼陳治世出任校長時，是為復校後的第六任校長，此時政大已有文理、法、商、外國語文、傳播等五個學院，26 個系所，算是一所在人文社會領域發展相當完整的大學了。

張京育祖籍湖南湘潭，中國對日抗戰爆發前幾個月出生，因此幼年時期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中成長，幸能完成小學教育；後因國共內戰爆發，求學頗受阻礙，直到 1949 年遷至臺灣宜蘭，才能在安定之中繼續學業。¹⁴1958 年自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1961 年獲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法學碩士。1962 年於外交部服務期間，考取中國國民黨設置的中山獎學金留學考試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學門。是時張京育考慮，「要了解國際政治，特別是聯合國的運作，紐約無疑是最恰當的地點……要了解美國政治外交的運作，自然以到華府攻讀為最佳選擇」，於是打算第一年唸哥大，第二年唸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

¹³ 李煥先生拍攝帶，VA728.886/8460. V.1-17。

¹⁴ 沈玉燕，〈執著一生的讀書人：專訪政大張京育校長〉，《律師法律雜誌》，期 49（1991 年 11 月），頁 20。

也同時申請到這兩個學校的入學許可。不過由於中山獎學金仍不足繳交美國私立大學的學費，但哥大發給入學許可時，特別註明發給學費獎學金，使其不致陷於窘境，於是哥大就成為首選。¹⁵

負笈美國的第一年，張京育在哥大法律學院接受比較法教育，除加深對法律理論之研究外，主要是探討美國憲法及法制。他在此一年期間，「透過老師的講解、個人的學習、對美國政治運作的觀察，深深植入我的腦海，融入我的心胸。做為一個法律人，遂以追求法治、摒棄人治與濫權為個人終身奉行的準則。」此外，他還得到學校的安排，到華盛頓拜會和參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巍峨的殿堂中更感受到法律的尊嚴」。他也曾利用機會拜訪紐約的稅務機關，瞭解美國稅法的運作相當務實。1964 年 6 月張京育獲哥大比較法碩士學位後，決定留在紐約，臨時申請轉入文理學院的公法與政府學系（後改名為政治系）研究所為特別學生，一年後成績合格，成為正式博士生，主修國際關係，副修美國政府與比較政治。就讀博士班七年期間，適逢傳統研究與行為科學研究的大辯論，百家爭鳴的情形，令他眼界為之大開。而哥大的紮實訓練和優秀師資，也令他頗有啟發。最後在撰寫有關聯合國研究的博士論文時，哥大的學術地位和紐約的地理位置，都讓他能比較順利地進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訪問和資

¹⁵ 張京育，〈開拓心胸、提高視野——哥大的博雅教育與我的學術和政治生涯〉，《傳記文學》，卷 85 期 6（2004 年 12 月），頁 105-106。

料的蒐集，終於在 1971 年獲哥大政治博士。¹⁶其後雖在美國西伊利諾大學短暫任教，但 1972 年 8 月即返回臺灣，曾先後任政治系、外交系教授，又兼任過外交系系主任、外交所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等職。政府職務方面，則出任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委員、新聞局局長。

取得哥大博士學位以後的張京育，大多數時間是在政大任教，作育英才無數，至今中華民國外交界或政壇人士，就有不少曾經是他的門生。除了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外，他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和社會風氣也相當關心，這可能與他攻讀博士期間，在紐約經歷過「保衛釣魚臺運動」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衝擊有關。1973 年 4 月創刊的《人與社會》雙月刊，匯集了一批海內外學有專精的人文社會中國學者，張京育不僅是社務委員之一，也出任第一任社長，直到 1977 年 4 月才卸任社長之職。這份刊物的宗旨，「在於傳播現代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知識與方法，並運用此種知識與方法分析中國文化及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在這一塊公開的園地之中，可以讓國內讀者有機會分享旅居海外中國學者學術研究的果實，也希望國內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將「治學心得提供海外讀者以至國際學術界，使國外瞭解國內學術發展的方向與水準。」此外，《人與社會》刊登的文章除了強調學術性外，也著重普及性與相關性，要「能深入淺出，便高中程度以上

¹⁶ 張京育，〈開拓心胸、提高視野〉，頁 106-109。

的讀者都看得懂，同時要使他們對討論的內容發生興趣。」¹⁷顯然，張京育和學界友人有心藉由《人與社會》雙月刊的定期出版，為國內大眾帶來一波啟蒙的刺激。

1973 年，張京育在臺北政府的蔣經國時代展開不久，就曾寄望新的政府領導階層，針對教育弊端作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直言無諱地指出弊端所在及改造方向如下：

一、為人作嫁：未能有計畫培植本國需要的人才，結果使得大專教育成為留學外國的先修班，多數的留學生楚材晉用，社會上仍是重洋輕華。「針對這一缺點，政府應制定一套全盤的政策，鼓勵真正替中國人服務的學人，鼓勵製作中國化的音樂、藝術、戲劇和影片。目前對留外學人的優待應予取消，而力求普遍地提高國內的學術水準和研究風氣。」

二、升學主義：此一毛病久為人知，主要是社會尊崇學位風氣使然。為了減輕此一弊病，應先確立職業神聖的觀念，從事各行業的人都受到社會的尊重，並取得適度的報酬。

三、空虛浮泛：即是教育界經常忽略了本國的實際需要，如此不管教育的量如何發展，對於國民的實益都有限。因此「必須從本國的實際需要上來檢討系別、課程、教學和研究。」

四、缺少擔當：雖然過去一再倡導倫理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卻沒有造就一個有擔當有作為的一代。而「政治上對教育界的限制過

¹⁷ 〈發刊辭〉，《人與社會》，創刊號（1973 年 4 月），頁 2。

多，也消磨了青年人的朝氣。結果許多青年人對中國的前途感到迷惑，喪失了為理想而奮鬥的勇氣。」

指出以上的弊病和改進之道後，張京育希望政府不斷鼓舞「學術界和青年人對本國社會的深刻關切。我們希望新生的一代能認清其時代責任，有勇氣、有毅力、有愛心，肯為中國和中國人努力奮鬥。」¹⁸

1979 年臺灣的經濟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政府雖然遭逢與美國斷交的衝擊，但局面尚稱安定。此時傳出教育部預定在未來十年內成立十個規模龐大的國立學術研究所。對此報導，張京育寄望政府和社會能為默默耕耘的人創造優良的學術發展環境，包括：（一）人力財力的充實，（二）要使研究者安心研究，（三）應當鼓勵學術自治，避免中央專權，（四）要鼓勵創造發展，打破假平等。如此才能逐漸邁向學術獨立的坦途。¹⁹

再過十年，張京育於 1989 年 8 月出任政治大學校長。是時臺灣已由蔣經國時代進入李登輝時代，實施約四十年的戒嚴令也宣告解除，整個社會的活力，似乎要從各方面逆發出來。而長期以來處於敵對狀態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則在「六四」民主運動之後，顯得更為嚴峻。由於外界出現的一些變化，臺灣的大學校園或多或少也受到了

¹⁸ 一民，〈我國教育往何處去？〉《人與社會》，卷 1 期 4（1973 年 10 月），頁 49。

¹⁹ 張京育，〈建立獨立的學術體系〉，《人與社會》，卷 7 期 5（1979 年 12 月），頁 35。

影響。

張京育就任校長之初，即指出：「大學教育必須是人才教育。大學不是文憑製造廠，大學不是職業養成所。大學除了創造和傳播專門知識以外，更重要的是培養篤實踐履，端正風俗的領導人才。」他又強調：「大學應本著學術自由、學術自主的原則來辦理，使老師與學生能夠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學習知識，培養器識。但是學術自由、學術自主的原則與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絕不是相違背的。」²⁰對於政大的學術發展，張京育提出：

要增設獨立的理學院，培養科學精神，要加強文學、史學、哲學、藝術方面的研究與教學，成立藝術學院，深化校園人文主義的精神；要加強國際事務的研究，成立國際事務學院，以開拓視野，面對世界；要加強並普及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關心十一億大陸同胞的處境與走向，早日重建自由、民主、繁榮、開放、統一的中國；亦要加強臺灣經驗的研究，以期提昇臺灣經驗的內涵，並擴大其影響力。²¹

這一段期許的話語，適足反映了政大本身和張京育個人的特色，以及時代環境的需求。政大原有著很好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基礎，張京育的研究和教學也偏重在外交事務，而臺海兩岸互動的增加，使得兩岸關係的議題必須及早因應。因此張京育對於他所主持的政大學術發展重點，有如是的期許。

²⁰ 〈張校長在本校校長交接典禮中講詞〉，《國立政治大學校刊》，期 186（1989 年 10 月 31 日），頁 5。

²¹ 〈張校長於本校六十三週年校慶大會致詞〉，《國立政治大學校刊》，期 190

具體校務方面，張京育著力於推動學術研究，「希望引領校園內師生共同參與、科際分工合作的研究風氣」。對於培育優秀人才，則展開對學生的問卷調查，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同時要求教師提出授課的講授大綱，每週排出時間接見學生。學術之外，他還強調社會服務，與社區召開座談會，「希望藉由實質的敦親睦鄰行動，達到社區資源共享、共存共榮的目標。」這些舉措在當時推動起來，不免遭遇到了一些阻力，²²但是若干年後，臺灣的大學多已朝這樣的方向發展。

人文主義的教育觀是張京育所重視的，他也經常強調政大「尤其要加強文學、史學、哲學的教學，並且創造一個可以供師生涵泳藝文思想與生活的良好環境。」他認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是需要「透過個人人格的昇華，促成社會價值與品味的昇華。」²³臺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對於人文思想濃厚的政大衝擊較小。1991 年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抗爭對象並非學校本身。至於引起各方注意的「臺灣為何沒有一所一流大學」的討論，就張京育來看，「一流大學的指標是學術研究是否具有世界水準，畢業生在社會上是否嶄露頭角。」政大之教學、學術研究、培養人才三者並重，並不偏廢任何一項。²⁴

1994 年 3 月張京育卸校長職，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對其四年

(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9。

²² 沈玉燕，〈執著一生的讀書人：專訪政大張京育校長〉，頁 20。

²³ 〈張校長京育博士於本校六十五週年校慶大會致詞〉，《國立政治大學校刊》，期 200 (1992 年 7 月 3 日)，頁 1。

²⁴ 《聯合報》，1991 年 10 月 28 日，頁 3。

多校長任期的表現，他表示：「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²⁵不過擔任監交的教育部次長楊朝祥倒是指出其校長任內，「對於校務發展計畫的策訂與推展、校園的整體規劃、校舍的興建、行政化電腦的推行，以及學術研究風氣的提昇等，竭盡心力，貢獻卓著。」²⁶可以看出張京育對政大的成長與茁壯，付出了相當大的心力。

三、劉源俊與東吳大學

本文討論的三位校長之中，以劉源俊年紀最輕，而其所主持的東吳大學，則是創辦於 1900 年，比中山大學和政治大學成立要早，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早設立的西制大學。

劉源俊於中國對日抗戰最後一年，在雲南出生。1966 年自臺灣大學物理系畢業。1967 年赴美，1972 年獲哥大物理學博士。就讀哥大的五年期間，除了專業知識的學習之外，美國社會的變化（反越戰、學生運動）與海峽兩岸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臺灣的外交挫折），都給他甚多的啟發。

劉源俊自述其在哥大求學期間，所獲得的經驗有以下幾點：

一、專業的認識：就讀臺大物理系時，劉源俊雖讀了不少專業書籍，但欠缺師長的引導。到了哥大，才真正瞭解什麼是物理學、物理研究。物理應該是理論和實驗的結合，哥大的理論物理很好，但要透

²⁵ 《聯合報》，1994 年 3 月 3 日，頁 2。

²⁶ 〈本校舉行校長移交典禮〉，《國立政治大學校刊》，期 209 (1994 年 5 月

過實驗來驗證。而在哥大物理系，能選修像李政道這樣的諾貝爾獎得主所開的課，也是難得的機會。

二、大學教育的瞭解：哥大有 Columbia College，為大學部，著重的是開明教育（liberal education），四年之後才選擇進入專業學校（professional schools），才有深切的體會，這和臺灣的學生一進入大學就分屬不同的學系，差別甚大。

三、東亞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一般就讀哥大的中國留學生，都會流連在東亞圖書館閱讀中文書報，以解思鄉之苦。除了這個目的之外，當時中國現況的發展也促使劉源俊常有機會利用圖書館館藏。為了與左派學生辯論有關中國問題和臺灣前途等議題，必須時時充實自己的學識，因此透過豐富的館藏更加認識中國的文學、歷史、政治。

四、對前輩留學生的體會：哥大曾經造就了不少在中國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自教師學院畢業，或從其他專業學校畢業而投入教育工作者，不少人在各個階段參與了中國教育之改革。此外，能與數十年前的前輩留學生，於不同時間就讀同一學校，不免對其思想和心路歷程多加探索。²⁷

1971 年劉源俊仍在哥大就讀博士班時，就向當時的東吳大學端木愷（1903-1987）校長毛遂自薦，獲得端木校長的邀聘，遂在 1972 年 6 月獲得博士學位後，8 月即到東吳大學物理系任教，迄今超過 30 年。他曾任物理系副教授、教授，並曾擔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教

20 日），頁 12。

務長。1996 年 8 月，更成為東吳大學創校以來第一位經過公開甄選，且完全不具有法政和教會背景的校長。²⁸

哥大的求學經驗對劉源俊在東吳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確實有一些影響。由於哥大重視理論和實驗的相結合，因此劉源俊授課時也很重視「數量級的估算」，並在教學方法上注意潛移默化。有些哥大物理系的名師會在報章上發表科普的文章，也使得劉源俊在留美時期，就參與《科學月刊》的創刊，以及返臺之後繼續推動科普工作。而《科學月刊》的成員，也積極投入了 1970 年到 1971 年的保釣運動。其後數年，劉源俊為這段風起雲湧的歷史留下了珍貴的紀錄，²⁹ 也在校長任內，促成了 1996 年 10 月 14 日由東吳大學學生會主辦的探討釣魚臺主權歸屬的研討會，以及 1997 年 5 月 24-25 日由東吳大學主辦「釣魚臺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

除了物理學的專業學術研究和教學之外，劉源俊還是一位極度關懷社會的科學家。1972 年自哥大學成歸國後，成為《人與社會》的社務委員，並自 1973 年創刊起，至 1975 年 6 月止，擔任副社長，也不時發表文章，評論學術與社會問題。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勇於建言個性，曾被媒體封為「憤怒小子」。³⁰ 尤其是從 1980 年代

²⁷ 訪問劉源俊先生，2004 年 7 月 12 日，臺北東吳大學校長室。

²⁸ 《聯合報》，1996 年 8 月 1 日，頁 7。

²⁹ 劉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學生保釣運動〉，《人與社會》，卷 6 期 2（1978 年 6 月），頁 41-52。

³⁰ 《聯合報》，1988 年 2 月 8 日，頁 21。

中葉以後，教育問題甚受各界重視，劉源俊不時對其中若干議題表達看法，對高等教育則是特別關心，所以他也是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的成員之一。他曾就大學與政府的關係、大學校長是否適宜從政、大學法的修正、大學教師的分級與續聘、大學入學制度、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學程制的推動、師範院校的設置等議題，發表專文討論。他強調大學必須自主，「一方面教育部應給予各大學有自主的空間，一方面大學本身應發展特色、課程，實踐其辦學理念。」而他主張的大學學程制，在於「學生必須有主修、副修，取代現有的學系。學院負責學生之教育，規劃課程、主修及副修；而學系負責教師之研究，及幫學生開課。」³¹

負責校務行政工作之後的劉源俊，也曾嘗試以哥大經驗來進行改革。如教育部的大學法修訂，劉源俊率先提出「系所合一」，並在東吳大學教務長任內大力推動，把原來的「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觀念，改變為系裡面的學程(programs)。另外，鼓吹取消碩士學程的資格考試，而博士學程則要以領域的廣面，來作為考試的要求。這些改革的方向，有時受限於既有的法規，只能見諸實行在東吳大學，且還不免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而就整個臺灣的高等教育而言，就更不易推動了。³²

從事大學教育改革多年之後，劉源俊接任東吳大學校長。就任之

³¹ 莊志明採訪，〈從理工人觀點談我國高等教育——專訪東吳大學物理系劉教授源俊〉，《教育研究雙月刊》，期 26 (1992 年 8 月)，頁 9。

³² 訪問劉源俊先生，2004 年 7 月 12 日，臺北東吳大學校長室。

初，他即表示「大學為教師、學生、行政三體，校長一職便是建立完善制度整合三體，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份。」他所擘畫的東吳發展藍圖，包括重新規劃各學院課程、檢討招生制度、重視通識教育；同時也要充分運用社會資源與尋求各方協助和合作，來為資源不甚充裕的東吳開創新局。要把東吳發展成精緻而充實的高等學府，終極目標則是使東吳成為「臺北市最好的民辦學府」。³³

具體校務方面，劉源俊重視學校內部權責的釐清，每一項重要任務都應有相對的組織設計，以期確實發揮效能，因而首創了專責招生業務的招生組，又在學生事務處下成立學生住宿組，提供學生校內外住宿照顧和服務；另設立發展處，專責募款和校友聯絡等重要業務。

³⁴ 關於通識教育，他在 1997 年推動成立「共通教育委員會」，將原本的「共同科目」和「通識學分」作一整合，這是他堅持「共通教育」之名與委員會之機制。³⁵ 此外，1998 年劉源俊接受共通教育委員會委託執行教育部「東吳大學共通教育理念建構與課程規劃研究」，建構落實東吳大學辦學精神與理念之共通教育。2001 年東吳

³³ 〈劉源俊接掌東吳大學〉，《海外學人》，期 285 (1996 年 10 月)，頁 23。「三體」中的「行政」，劉源俊在另一篇訪問中稱為「職工」，見孫梓評，〈大學之「道」：訪東吳大學現任校長劉源俊〉，《文訊雜誌》，期 198 (2002 年 4 月)，頁 38。劉源俊對中國近代民辦大學的發展，也曾做過考察。見劉源俊，〈民辦大學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意義〉，《教育資料文摘》，期 247 (1998 年 8 月)，頁 3-12。

³⁴ 孫梓評，〈大學之「道」：訪東吳大學現任校長劉源俊〉，頁 37。

³⁵ 葉海煙，〈大學通識教育的華人觀點——以臺灣東吳大學為例〉，「第三屆華人地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全球化時代的大學通識教育」論文，

大學獲教育部補助進行提昇共通教育基礎計畫之「東吳大學共通教育課程實施計畫」，2002 年起逐步實施以研究成果架構的共通教育新課程。³⁶此計畫涵蓋面甚廣，借用劉源俊本人的話來說：「共通課程的重點，在於將具有基礎性與普遍性的基本學科予以強化，做為學生專門學術領域延伸。」³⁷

在劉源俊的認知中，東吳大學有著「開明的基督精神、傳統的儒家精神與現代的革命精神」所共同型塑的東吳精神，使得東吳具有了豐富的人文傳統。他需要傳承與實踐東吳的人文傳統，在校園裡落實倫理、民主、科學、宗教、藝術等人文精神的內涵，具體的做法包括：校區、職務、學生社團的正名，校內每年四項重要典禮的隆重舉行，透過課程調整與新編教材以培養學生的專業、通識與宏觀，以及屢次舉辦藝文活動與學術界大師的講座，藉此把東吳大學建造成「人文學術的清源。」³⁸

在他八年的東吳大學校長任內，正好也是臺灣經過政黨輪替，社會變動加劇。這一時期與教育改革相關的議題，比 1990 年前後更多且更受矚目，劉源俊自是不會缺席，報章依然常見他的言論與投書，

³⁶ http://vschool.scu.edu.tw/Class02/Content.asp?Data_Code=143

³⁷〈東吳大學共通課程教學提昇計畫〉，http://www2.scu.edu.tw/curr/curr1/scu_func3.htm

³⁸〈東吳首創軍事教育列共通課突破傳統軍訓窠臼〉，<http://www4.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EntDigest/Life/cna-cc98fd5-rbk3.html>

³⁹孫梓評，〈大學之「道」：訪東吳大學現任校長劉源俊〉，頁 36-39。

為文批評，提出商榷，如對多元入學方案、卓越計畫、大學合併、大學評鑑、九年一貫課程……等等的討論，³⁹這些議題涉及層面甚廣，本文限於篇幅，不擬進一步討論。

四、結語

臺灣自 1949 年以後，雖然生存時時受到威脅，不過國內尚能維持穩定的局面，教育體系正常發展，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留學教育的持續，且以留美人數最多，自然使得臺灣受到美國大量的影響，也加強了臺美之間的關係。

留學哥大的臺灣學生為數甚多，學成之後返回臺灣者，多成為各行各業的領導菁英。本文所考察的三位校友，均擔任過大學校長。李煥於 1950 年代留學，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期，幾乎是負責創辦一所新的中山大學。張京育是在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初期在哥大就讀，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擔任已有良好人文社會學科基礎的政大校長。劉源俊也是在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初期負笈哥大，而其出任東吳大學校長的八年，正好跨過世紀之交。他們三人見證了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更各自為高等教育投注了心力。

³⁹ 劉源俊，〈學術發展與政府政策〉，《教育資料文摘》，期 253（1999 年 2 月），頁 3-6。黃雅鳳，〈為新時代教育暖身——東吳大學劉源俊校長談高等教育的展望〉，《師友月刊》，期 416（2002 年 2 月），頁 15-18。曾素琴整理，〈從「錢」談起——劉源俊校長談校務發展基金與教改〉，《教師天地》，期 120（2002 年 10 月），頁 37-42。

綜合言之，三人出身背景不同，進修專業也不同，但是前後在哥大就學以及在紐約生活的經歷，同樣成為他們從事教育工作的基礎，也是他們自身事業發展的重要資產。在辦學理念上，都有承襲哥大受教經驗的意圖，除了重視專業知識的傳授，三人均強調人文精神的教育，並有具體的做法以力求實踐。三人也都著重大學和社會的互動，避免師生深鎖學術象牙塔中。由以上三位校長辦學理念的落實，或能進一步體認哥大教育的特色，及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離開中山大學的李煥，先後出任教育部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行政院長，現為總統府資政。張京育調離政治大學校長一職後，先是入閣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繼而歷任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及中華歐亞基金會董事長。兩人在大學校長任期屆滿之後，繼續在更重要的職務上為國服務。劉源俊於 2004 年 8 月 1 日卸任，他的自我規劃是：除了繼續教書、讀書、關心教育問題，還要做一個民間公正人士。知言敢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劉源俊，仍將是臺灣學術界的一名活躍人物。

Tung Li Yuan 袁同禮 (1895-1965) and the Chines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Tsing YUAN 袁清*



* The author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Dayton, Ohio. E-mail: tsingyuan@msn.com.

He received his Ph.D.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1969, taught at Swarthmore College before starting his teaching career in 1972 at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at one time the Chairman of its History Department. He has also taught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on Ming History, Central Asian History, and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He also served one term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 in North America.